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y SUSAN GREENHAL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xxii, 403pp.**

中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快30年，該政策的一些社會後果，諸如老齡化的加速，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調等，已逐漸明顯。當年的獨生子女如今面臨沉重的社會壓力和生活負擔。然而，國內學術界卻鮮有專門研究來反思這一政策，並思考如何應對該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後果。相反，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人類學教授葛蘇珊（Susan Greenhalgh）卻花二十多年的時間來專門研究這一政策，並於2008年出版其專著：《獨生子女：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科學與政策》（*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集中論述1978-1980年這一歷史時期中，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如何被制訂並推行。

作者以三個互相聯繫的概念：政策問題化、政策集合以及科學決策與政策制訂的微觀政治，貫穿全書的分析，其目的是回答以下四個問題：獨生子女政策的由來及其影響，以及該政策可能的未來方向；對整個國家政策而言，產生了獨生子女政策的「科學決策」過程有什麼意義，這種新的決策方式將如何重新調整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重新調整又將怎樣塑造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現代化形象；「科學決策」所引發的一系列對現代化問題的探討，例如，是什麼將人口問題賦予了政治上的重要性等；對於理解現代政策、政府權力，人類學能夠在理論、方法以及倫理觀方面作出哪些貢獻。

爲了清楚闡述上述問題，作者將政治學、人類學以及科技研究領域（STS）的相關研究方法相結合。在1985-2006年期間，作者陸續對獨生子女政策制訂過程中的相關人員進行了口述採訪，掌握了大批一手資料。這些政策參與者提供的材料對於理解政策的出台無疑具有關鍵作用。以豐富的材料和可靠的研究方法爲基礎，作者精心構思了其著作。全書主體部份共七章，分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即全書第二章，作者追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直到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頒佈前，有關中國人口問題的歷史。在這一意識形態至上的時期，「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被中共政府視爲異端邪說。雖然毛澤東也意識到中國人口問題嚴重，並曾提出控制人口的言論，但他在這一問題上前後態度矛盾。尤其是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被視爲「馬爾薩斯」理論的

支持者，遭到政治迫害，更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無人問津。「文革」期間，中國的科學文化領域遭受了巨大破壞，以至於當人口問題嚴重到必須面對的地步時，中國卻缺乏相應的人口資料和可靠的研究方法。

197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言論，這對該領域的研究無疑是極大的刺激。但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障礙仍然存在，將中國的人口控制與西方的「馬爾薩斯」理論劃清界線乃是當務之急。在國務院授意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部門負責人劉錚開始將人口控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從而為中國的人口控制創造了合法的理論基礎。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全國普遍推行，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1971-1978年期間，人口出生率從30.7%下降到19.3%。在作者看來，這一辦法比後來的獨生子女政策更為人性化，並能夠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同時，由於它照顧了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更容易得到農民的支持。但是，「文革」時期的災難性破壞使得毛澤東時代的一切政策都被視為「意識形態」的產物，這一相對溫和的計劃生育政策，被後毛時代的新一代領導人以「科學」為名加以否定。那麼，此時，何種理論方法才能被視為「科學」，並在中國的人口研究領域佔有支配地位？對此，作者在第二部份進行了解答。

第二部份包括三章，即全書的第三至第五章，題名為「制訂人口科學」，主要介紹了在歷史的轉折時期，在有關中國人口控制問題上的三種主要思想：同屬社會科學的馬克思統計學和馬克思人文主義以及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中國化控制論。這三種思想的代表人物分別是劉錚、梁中堂以及宋健。在作者看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相互競爭的關係，兩者都試圖擴大其研究領域。在這一過程中，自然科學家憑藉其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以及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逐漸將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人口問題轉化為自然科學的研究範疇，並最終在這一領域佔據支配地位。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轉變，是因為在「科學」至上的鄧小平時代，相對獨立的自然科學研究更能為政策提供「科學」的理論基礎。

以劉錚為代表的馬克思統計學原本是制訂中國人口政策的權威，其「最好一個，避免三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文革」後期相對溫和的「晚稀少」政策一脈相承。在作者看來，劉錚等人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他們人口控制的理論基礎仍然是意識形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精神顯得格格不入。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計劃生育政策無法讓中共領導人滿意。與此相對，宋健等自然科學家則完全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他們移植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想，並將中國的人口增長描述為一場關乎人類走向的

生態災難，這使得中國領導人馬上充滿了強烈的「危機意識」。而當宋健等人採用現代化的研究手段，結合電腦和數學模型等方法展示其研究成果時，劉錚等人的統計方法和研究手段則被視為陳舊而毫無意義的。因此，宋健等人提出的獨生子女政策在中共高層看來無疑更為「科學」。不過，宋健等自然科學家卻沒有考慮這樣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社會後果。作者將這種忽視歸結為出身自然科學領域的宋健等人的人文、社會知識的缺失。帶有馬克思主義人文色彩的梁中堂因此極力反對宋健等人的獨生子女政策，並認為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後果，只是這種反對並沒有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的走向。

作者的描述向我們呈現了一幅科學家相互競爭的畫面，而其將宋健等人的研究視為純學術化的研究，更讓這種競爭看上去像一場學術上的辯論（至少在宋健等人的思想被中共領導人接受之前）。然而，正如作者所說，中國的科學家極易受到政治的影響。只是作者對這種影響的關注更多的集中於社會科學家。事實上，自然科學家在「文革」期間受到特殊保護，以及擁有獨立研究的空間，但並不表明他們就能遠離政治的影響。相反，正是因為中共的特殊保護，使得這批自然科學家有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可以說，他們既是科學家，更是中共政策制訂的幕後策劃者。當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需要更「科學」的理論基礎時，軍事研究專家宋健帶來了一套全新的「科學」化解釋系統。因此，作者描述的這場競爭很難是一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爭奪戰。而宋健等人的勝利與其說是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勝利，不如說是政治對人文主義的勝利。當然，作者並不否認科學政策的背後有政治力量的塑造。只是作者所持的這種科學和政治的相互影響的觀點並不影響她對宋健等人「非政治化」的判斷。雖然她知道中共領導人對宋健等人的觀點知之甚早，但她並沒有據此懷疑宋健等人的行為是一場「科學」外衣下的「政治行為」。相反，她認為，這表明科學對政治的影響比我們想像的要大。

為了進一步呈現科學和政治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的相互滲透，作者在最後一個部份「制訂人口政策」中，以時間為序，說明了宋健等人的「科學」政策是如何被中共高層接受並得到全面貫徹的。然而，當作者努力勾勒科學對政策出台的影響時，她卻承認在1979年末，中共領導人就已經決定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因此，作者在最後一個部份所提到的1979年的成都會議，宋健等人發表大量論文來吸引更多的支持者以至中共高層在中南海作出最後決定，在全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並發表告全國人民書時，這一切體現的只是政策如何利用「科學」來建立其合法性，而並非科學對政策制訂的真正影響。

最後，作者對全書的主要觀點進行了總結，並對獨生子女政策進行了深刻反思。她認為，在獨生子女政策出台的過程中，宋健等自然科學家起了關鍵作用，這是科學與政治相互影響的一個典型。但這同時也是一個在科學引導下，制訂出錯誤政策的典型。不過，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科學誤導了政策的制訂，不如說是這一政策借「科學」的光環來照耀其出台。

雖然筆者並不認同作者在著作中的部份觀點，但這並不能否認該書的學術價值。作為第一部全面探討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術專著，作者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為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正如作者所言，她試圖將本書內容傳達至不同學科背景的讀者，包括來自人口研究、婦女研究、科技研究及自然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從這個角度而言，作者的研究是成功的。同時，作者更希望其著作能幫助中國盡快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或許這也是本書另一個價值所在。

孫琦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  
**By XIAOBING TA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xi, 318pp.**

美國南加州大學唐小兵教授的英文近著《中國先鋒的起源：現代木刻運動》（*Origin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The Modern Woodcut Movement*），全書除序言與結論外，分為五章。第一章「藝術美之追求」，第二章「作為主觀激情話語的藝術理論」，第三章「新藝術運動及其視野」，第四章「藝術先鋒之形成」，第五章「先鋒與民族想像」。各章具體內容，可參考胡榮的介紹，在此從略。

該書為一部描繪中國20世紀20、30年代現代木刻運動歷史的著作。唐氏用多年時間完成此著作，精心結撰，自不待言。唐氏一直以中國現當代文學、藝術理論及運動、思想史以及大眾文化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大眾文藝方面的歷史。現代木刻運動與左翼文學、當時所謂大眾文藝有相關聯繫，故唐氏的研究背景於該著作大有裨益。該書部份內容曾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如全書結尾《〈怒吼吧！中國〉的迴響》，原文寫於2005年7月，當年發表在《讀書》（2005年第9期）。唐氏論《怒吼吧！中國》這幅版畫時，一開始就提及「表達」與「喚起」的深意，一方面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評論這幅作品，將